

櫻花與武士

那些決定日本的细节

村八分。
一所悬命。
八百万神的国。
知伤感之心。
一期一会。
物语。
神道。
康议制。
神·佛·儒习合。
世间。
武士道。
禅宗流。



孔祥旭●著

同心出版社



櫻花與武士

那些决定日本的细节

孔祥旭●著

同心出版社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内大街20号
 邮编：100734
 电话：(010) 82304003 (总机) / (010) 82304003 (发行部)
 电子邮箱：tongxin@ppl.com.cn
 印刷：北京小红帽印刷厂
 装订：普通胶装
 版次：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5
 字数：250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价：36.00元

同心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樱花与武士/孔祥旭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0716 - 580 - 4

I. 樱… II. 孔… III. 日本—研究 IV. 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909 号

樱花与武士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 100734

电 话: 发行部: (010) 85204603 (外埠)、85204612 (本市)

总编室: (010) 85204653

E - mail: txcs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一团矛盾的常识

一

许多年前，就听港台的学者讲，与其直接学习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不如学习日本的经验，尤其是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方法。这可真是造化弄人。向日本学习，而且日本还是更值得学习的对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尴尬的研究课题了，简直就是对中国人智慧和胸怀的考验。即使在今天，每当我置身于现实和历史之中观察日本时，仍恍惚于理性与情绪之间，并时常被一些日本人的刺激言论搞得热血沸腾，很难保持冷静的研究状态。专家们总是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非常缺乏，或许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平常地看待日本，其原因众所周知。

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那时日本的求知欲还真让老师感动。他们九死一生地拜师而来，什么都学，也什么都拿，就连国家的名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主动要求老师认可；当然老师对这个学生也是慷慨得不得了，不仅是什么东西都教，还什么东西都给，甚至还有像鉴真和尚他们那样的非政府组织，九死一生三番五次地跑到日本做义工，既传道也普及技术，最后死在日本。这就是常说的中日之间两千年的友好。

但到了近代就出问题了，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的几十年。其间，自西而来的“鬼畜”（“鬼畜美英”是二战结束前日本人对美英国家的战争用语）用枪炮击到了老师，恩师的虚弱让打小就坚定跟随的学生着实吓了一跳。按理说，搭把手帮一把也是人间的情理，但这可不适

用于国家之间，而且学生也自顾不暇。本来老师教外国学生也没想图什么回报，学生帮不帮助老师也无可厚非。但日本的做法却是，先与昔日的老师划清界限，然后拜强者为师，“脱亚入欧”，充当西方列强的尖兵，打起昔日的老师来。

这一打，老师似乎有所醒悟，开始以过去的学生为师，师生关系就此逆转。向日本学习，成为当时中国锐意改革的有识之士的潮流，其影响之大，甚至还波及了边远地区的进步小青年——未来中国的革命后备军。比如，毛泽东就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道：“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不仅认识上如此，在学校里，毛泽东还通过坚持洗冷水浴晒日光浴等“野蛮其体魄”的方法大练武士功，以养平天下的浩然之气。

不过，这一回，中国这学生当得可不容易，因为老师一直在打击学生，而且是极其野蛮的暴行——20世纪中国人最大的苦难正是来自日本。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遭了报应。按常理，对恩将仇报的日本，中国怎么做都不过分。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句“以德报怨”，就基本结束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清算；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安全遣返了大批在华日侨，甚至民间还抚养了许多日本人遗失在中国的小孩。

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确实刺激了中国，但也让中国得到不少启示。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里，“借鉴日本经验”成了中国向外国学习的一个重点。而且日本也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业务指导。但是，近年来，中日间短暂的“蜜月期”算是结束了。

有人说，中日最终将走向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怎么才算正常呢？现在的情况据说叫“政冷经热”，这可算不了正常吧？都说要相互理解，但怎么个理解法儿？在中国人看来，现在日本右翼的挑衅，特别是新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问题，就是在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并且，在搞现代化方面，你日本是过来人，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比中国人自己还清楚中国的问题，但在中国面临外部压力时，却总有一些日本人的声音和动作让中国人不舒服，这让中国人怎么

个理解法儿？

一次，一位中国留学生从日本朋友家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说，日本人帮你忙时总好像是在施舍，说话还要顺着他们。我说，你们是不是又谈到了日本人的战争罪行。因为我知道，现在有许多日本人想让中国人改变对日本人的看法，特别是在请你客帮你忙的时候。这个留学生的回答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这个日本朋友最后还是承认中国人收养了日本人丢失的孤儿，与其他许多不曲解这件事情的日本人相比，他还是很善良了。

二

日本人常说：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相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是贫弱的。老实说，这是事实。因为中国了解日本主要是为了学习其现代化的经验，而日本之所以要了解中国，却与日本对自身的认识有关，因为要弄明白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就必须从中国的影响着手，甚至现在的日本人要了解自己早期历史的文字记录，还要求助于中国的古书。

现在，随便走进一家日本书店，就可以看到大量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不仅有学术著作，还有不少通俗读物和漫画。如果是到一家日本图书馆看看，关于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及专著图片更是多得不得了，其信息量绝不亚于许多中国的同级别的图书馆。怪不得郭沫若的一些中国古代史的代表作是他当年在日本时写成的。

实际上，近代以来关于中国艺术建筑等领域的专门史，甚至一些地方的地名学，也是日本人最先出版著作的。台湾作家李敖谈过这样一件事：他台大的老师里，就有因为长年独占学校里日本人研究中国法律史的资料而堂而皇之地做教授者。每当看到日本一年一度的文化功劳奖得主中不乏研究中国的专家时，我总是在心里核计，中国现在的知名学者中有没有研究日本的专家？但每一次，我都后悔自己读书看报太少，孤陋寡闻。

老实说，我们将要了解的对象——日本人——至今仍披着神秘的面

纱。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像日本人那样如此鲜明地集人类共通的“美德”与“恶德”于一身，也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像日本人那样如此强烈地扰乱人们看待其他民族的一般思路。

大而观之，日本的崛起很有些暴发户的性质。一个穷小子突然暴富，一开始他趁火打劫、以强凌弱、巧取豪夺、见利忘义；当然他也为一些人提供了非常规的致富速成法——用句时髦的话讲，这算是“大国崛起”。有时，他这个来自穷乡僻壤、需要拯救的异邦人的发达，甚至会让他的西洋老师也浑身不自在，责备他不按牌理出牌、搞阴谋诡计。有些西方人甚至认为，日本的发展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黄祸（引自别枝笃彦著《不被理解的国家：日本》）。

外人的看法自然让他很不舒服，让他觉得孤独、不被“国际理解”。本来么，凡事异常敏感就是暴发户的通病。他觉得委屈，觉得自己是“国际孤儿”。在他看来，自己发财是由于顺应国际潮流，靠的是自己的手艺，是由于自己的勤勉、灵巧、会节省、守纪律以及家和万事兴；再说了，现在市面上的体面人儿，绅士富豪全算上，上数几代谁家干净？大家只是在捞足了钱之后才开始“从良”。

于是他觉得靠钱可以摆平一切，用钱可以掩盖自己过去不光彩的历史。他大搞公益事业，给国际组织捐款，不仅要当捐款专业户，还要争当捐款状元；这还不够，还要找些笔杆子为自己重新立传。当然这些笔杆子要有名，特别是有名的洋人。但最后他还是发现，文人好找，让人尊敬难；给钱谁都高兴要，关键时候大家伙也不大帮忙。到头来，论名声，名声没有改善；论政治，政治地位也不如意。于是乎，他感叹道，日本的常识原来是世界的非常识！这就是世人眼里日本近现代百年史的一副活相。

细而观之，日本人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民族之一了。前些年在法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只有日本球迷呆过的地方最干净，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个袋子装垃圾。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北京为迎接奥运会开展文明活动，其中一项是改掉陋习，如随地吐痰、加塞儿、行

人乱穿马路、男人夏天光膀子等等，足有十几项。我跟随电视节目主持人罗列的事项想了一下，就我的所见所闻，这些陋习在日本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但是，日本人在……方面又是不通人性的。”——谈到日本时肯定会出来这么个“但是”，并且在“但是”的两头都很极端，而日本的“魅力”和“问题”就是由这些个“但是”组合起来的。看完这本书，你们大概也可以体会出一些“但是”的意味来。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对日本人有成见，看法太偏激，当然另一个近邻韩国人也免除不了嫌疑。那么，来自遥远国度的纯种老外对日本的想法该是中立客观的吧？不妨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个“但是”是如何转换的。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三脱三创》中谈到这样一个现象。阿拉伯人到日本第一年时，他们对日本充满赞誉。实际上，这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当中的普遍现象。在他们初到日本的印象里，日本的产业经济非常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城市清洁、安全、便利，在所有方面，日本都做得非常出色。但一年过后，对日本的评价渐渐变坏，到第三年或第四年时，评价达到最低。此时的他们会说，日本确实是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但是日本完全没有文化和道德。大多数到日本的留学生都是带着对日本的厌恶回国的，而这些人日本居住的时间有大多刚好在四年左右。亚洲各国反日运动的中坚分子大多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人。

也许有人又会说，这些人来自发展中国家，所以才会对日本有“偏见”。那么，我就再举一个西方人的例子，此人就是著名的小泉八云（1850—1904）。

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之三》一文里说：“世界上爱日本者向来以小泉八云为代表”。日本人也确实把小泉八云看成是日本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认为他是日本的著名作家。小泉八云原名叫 Lafcadio Hearn，是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后到日本的西方人，他与一位日本贵族的女儿结婚，并改随夫人的日本姓氏。小泉八云用英文写了大量介绍日本之美的书，这些书在西方影响不小，中国也有过翻译。我去过位于日本松江市的小泉八云故居，

确实气派非凡，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当年的生活也令人羡慕。我还注意到小泉八云穿过的衣服很像童装，忍不住边看边笑，心想：莫非全世界的小个子都喜欢日本？但话又说回来，我自己个子也不高。

尽管在小泉八云写的书里充满了对日本的赞美之词，但是，通过对小泉八云和亲友的通信的研究发现，他渐渐也对日本厌恶起来，最后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



至于我在日本的境遇，当然比小泉八云艰苦，而且在日本的居住时间也超过四年。这期间，有难受的时候，也有感动的时刻。但回头看时，还是有许多关于日本的不解之谜更激发我的好奇心。我想弄明白的是，日本这个特例，这个最先打破常规的现代化个案对近代以来西方确立的一些“普遍原理”所提出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打个比方来说，在此以前，常识认为天鹅是白色的，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只黑天鹅，它腿粗、翅短，但却飞得快而且高。于是，原来的常识就讲不通了。对此，有人把它看成怪物，也有人将其神化。我以为，这个“异常”正是做研究的好材料。

林语堂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文里说：“中日差异足以使两国成为敌对邻邦，中日相同足以加强彼此的仇恨心理。”也有人说得更通俗：中日之间很像是兄弟反目，虽说同文同种，但闹翻了还不如不同。

在中日之间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关系，因为毕竟是“一衣带水”，毕竟同是“汉字文明”。

按理说，“一衣带水”就要讲共生、讲互利，说白了，就是要讲稳定。但稳定不能靠“压倒一切”的办法压出来。在古代的东亚世界，中华秩序的稳定是自然形成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到了近代，日本搞“大东亚共荣圈”，要当盟主，尽管失败了，但至今仍有一些日本人有那种想当盟主而又怕别人当盟主的情结。日本人常说，日本是很不善

于按照平等原则和人打交道的。因为日本人的秩序感来自于等级关系，并且只有在等级秩序里日本人才能获得安心感。

近些年来，日本媒体常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亚洲的领导，也就是说，亚洲的领导是中国还是日本。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日本记者采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又提出这个问题，弄得从发展中国家来的老马不得不给发达国家的日本讲“平等互利”的启蒙课。实际上，盟主情结是要不得的，不能说有了个盟主大家就可以众望所归，过太平日子；如果放弃这种盟主情结而顺应自然，没准儿将来还真搞出个经济共同体什么的呢。

不过与“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相比，汉字文明所具有的“文缘关系”的作用往往不易被认识到，特别是在林语堂说的那种“敌对”与“仇恨心理”的情绪中，汉字文明的连带性更容易成为人们不愿正视的敏感问题。不过，中日之间的“文缘关系”毕竟不像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种宿命的无法摆脱的“同文”关系。也正是这种“同文”关系，才使得林语堂说的那种“敌对”与“仇恨心理”的情绪不那么单纯，而到处都表现出很奇怪的矛盾现象。

一百多年前，在日本搞“脱亚入欧”“去中国化”的时候，就有日本人提出废除日语，使用罗马字。我想，尽管中国这位昔日的老师让有些日本人觉得丢人，但如果把日语变成罗马字，仅仅考虑到日语汉字中无数的同音字引起的混乱，就不如干脆改用英语来得方便。

不仅如此，实际上汉字有着把文化类型和思维方式固定下来的强大功能。日本人多年形成的文化习惯和美感与汉字之间是血肉关系，比毛和皮的连带性还强。在这一点上，似乎日本的天皇家族更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根据中国的典故起名字和年号的传统。依我看，如果废除了汉字，被称为“型文化”的日本文化便没有了文字根基；而且，要完成这场文化大变革，还不如直接变日本人为白种人的生物革命来得痛快。

至于日本汉字词汇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现在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我只举几个有趣的例子。

先讲一个人们经常提到的笑话。曾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在《变法自强疏》里认为，“欧美各国，道远费重，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他甚至连教学方法也要求向日本学习。不过，尽管张之洞派遣过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习，但他自己却不喜欢日语。据说有一次他看到部下的行文中有“经济”二字，就批评道：“经济”两个字是‘日本名词’，不要用‘日本名词’。”但这位部下却无奈地回答说：“‘日本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也是日文啊。”

到底现代中文里有多少词汇来自日语，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据说，我们常用的人文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大约 70%来自日语汉字词汇。对此，你们可以随便找几本书来了解个大概。不过，我更喜欢作家阿城在《闲话闲说》中的那股超然劲儿，特引述几句给大家听。

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数，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我知道再举下去，你们大概要疯了，而以上还只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几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引进的所有汉字形日文词剔除干净，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几乎就不能写文章或说话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找上海辞书社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来看看，1984年初版，收词相当谨慎。我的一本是1985年在湖南古文县

城的书店里买到，一边看一边笑。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补上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的术语及名词，比如“自然科学”“物理学”“卫生学”“解剖学”“医学”“建筑学”“机械学”“冶金”“哲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心理学”“民族学”“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等等，甚至连“共产党”一词也是来自日本。

两年前我和一位老同学聊天，大概因为我以前是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他对我开玩笑道，最近有一本讲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书，看了之后好像马克思主义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而是从日本拿来的。于是我找来这本书。这就是德国人李博写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书中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如何从日本拿来有详尽说明，虽然我也曾经粗粗地看过日文版《资本论》，但没往这方面细想过。

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曾经留学日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最初也是从日文译本转译而来。本来嘛，拿来主义的时代，怎么方便怎么拿。日本人比中国人早一步引进西方近代文化，中国人看日文又容易，而且又有汉字带来的亲切感，所以从日文转译当然比直接翻译原著来得方便。这很像我十几年前听到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人翻译西方著作是先找来港台的汉语译本，变繁体字为简化字，出活儿不仅快而且多，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原始积累”吧。

这位德国人的研究挺有意思，比如，在“从日语中暂时借用，而后又被其他新词所代替的专门术语”一节中列举的术语有：由“工人阶级”代替“劳动阶级”，由“统治”代替“支配”，由“专政”代替“独裁”。现在看来这几个词是一定要换掉的，否则就不好解释“无产阶级专政”这类原则性话语了。另外，第三章“未受日语影响而产生的术语‘买办阶级’”，我查了一下日语字典，发现日语中现在有“买办”这个词，大概是

来自中文。按照日本权威词典《广辞苑》的解释，买办是指：“①在中国的外国商馆、领事馆等与中国商人交易时作为中介手段而雇佣的中国人。②靠服务于外国资本来得利，并且压制本国利益的人。”仅从字面看，日本国内比较排斥买办这种国际化的经营人才。

近几年来，市面上流行的新词儿，如“职场”“人气”“写真”“福祉”“过劳死”“自信满满”等，也都是日语里的常用词。这些词大概是从港台转口大陆的，因为港台文化中的日本元素一直不少。当然，其他类似的事也不少，比如，日本右翼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我们这里就有人跟进出版《中国可以说不》；日本多年前有“高尔夫球亡国论”的说法，这几年我们这里也有人提；许多年前日本提出“一村一品”，现在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提法……不再举下去了，否则，这回大家真的要疯了。

实际上，除了文字联系，两千多年的师生关系在中日之间留下了许多共同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已经成了习惯。习惯当然就会成自然。自然是容易改造的，无论大家愿不愿意。现在我们都知改造自然有什么后果。关于日本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正文中谈，下面简单地谈一点中国方面的情况。

2004年我回到北京，听到市面上到处播放台湾歌星刘若英唱的歌《后来》，我一边听一边笑。因为我想起自己刚到日本时也常听这首歌，歌名叫《向着未来》，是日本一个叫 Kiroro 的组合自编自唱的。其实，中国港台地区翻唱的日本流行歌曲还真不少，往往是日本歌曲一流行，就有港台音乐人重新填词翻唱，当然，调子会适当改变，把日本式的伤感变得欢快些。而这样的翻唱歌曲往往会迅速流行于港台，继而红遍大江南北。其中最有名的歌星是邓丽君，而且她在日本也用日语演唱，唱得相当有名。都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但日本的歌曲总不会被欧美人、印度人翻唱这么多吧。所以，你喜欢的我也喜欢，才能形成有共感的语言。这种有共感的语言是有边界的，而这个文化边界反映了不同文明的审美趣味。

当然，用概念来说明这种文化上的连带关系很困难，而通过一两个人物的真实事迹来体会其中的意味则比较容易。近代以来，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为止，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数大概有五六万了，其中的周氏兄弟——这两位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家的思想，最能反映这种文化上的连带关系。

先看哥哥周树人也就是鲁迅眼里的日本。在我的中小学时代，教科书里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大概是我那时知道的唯一的日本“好人”。后来，我读到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时，心里就想，这“硬骨头”就是硬骨头！居然在“九一八”事变后，他还对发出愤怒吼声的国人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并且鲁迅还说：“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大家知道，鲁迅是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他对传统封建礼教的残酷与虚伪的揭露批判无人能比，这是在“破”的方面；那么在“立”的方面，鲁迅的态度在这两段话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

鲁迅最初是相信靠讲故事的办法可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后来越来越失望。于是他先从娃娃抓起——呼吁“救救孩子”。别人的孩子管不了，就先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日本式教育。但是，鲁迅的孩子“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变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可以看出，鲁迅是希望中国走日本模式的。

在日本，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小册子，是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写的《百人一语》。书中印的一张相片很眼熟，就是常常看到的那张鲁迅的标准像，但一看文章才知道，相片是夏目漱石（1867—1916）40岁时的标准照。那时他还很瘦，不像现在一千日元上印的那张相片那么富态。不过仔细看，相片里的那胡子、那眼神、那发型，好家伙，太鲁迅了！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评价最高的作家，听说鲁迅在东京时租住过他家的屋子，他也是鲁迅非常喜欢的日本作家。

也是在日本，我买了一本在日本很有名的华侨作家陈舜臣写的《中国诗人传》，其中有一首鲁迅写的诗：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 春兰秋菊不同时

这首诗是我读过的鲁迅诗里最费解的一首。背景是1932年3月，上海事变后，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一家避难至英租界，住在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里——据说内山书店是鲁迅常去的避难所。避过风头后，鲁迅回家发现家中被盗，只留下书稿没动。此时，蒋介石对鲁迅下了通缉令，鲁迅的日本朋友们便邀请他去日本。诗中的“东云”无疑指日本。“芳林”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指当时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一种说法是指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让鲁迅很失望。但“不同时”的“春兰”与“秋菊”的所指却十分暧昧。是指鲁迅本人与同胞战友的分离吗？但鲁迅已经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是指中日关系吗？很难有个定论。我想，像鲁迅这样的“民族脊梁”，“翘首东云”的“梦思”不会仅仅是与日本的日久生情；老师欺负学生而他又想劝学，这恐怕也是鲁迅对“不同时”的一个痛苦吧。

然而，日本模式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对其间的尴尬境遇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要数弟弟周作人。中国文人中恐怕没有人能超过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甚至是喜爱；而欧美的知日派由于他们对日本文化的

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无法与周作人相比，所以，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在外国人里应该是最深的、最典型的。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多年，他翻译了一批日本古典名著，即使在日本，仅仅是读完这些书的文人也不多。周作人有个日本太太，他喜欢日本吃食，还非常喜欢喝日本清酒；他做过日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但周作人毕竟不同于汉奸政客，他对自己在文化理解上的忠诚度也是让人难以怀疑的。当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不让说但又想说，就要艺术地说，暧昧地说。这种性格到死他也没改掉。而且，原本周作人就有日本人那种暧昧性格。所以理解周作人说的话，特别要体会他惯用日常小事来表达文化大问题的手法，也就是话外音。下面我们来读几句。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北京的茶食》1924年作）

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日本的衣食住》1935年作）

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国外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东西，尤其显著，如有名茶点的“羊羹”，便是最好的一例。（《羊肝饼》1957年发表，以下几句话也均出自此文）

“羊羹”这名称不见经传，一直到近时北京仿制，才出现市面上。

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

够尴尬的吧？一块小点心的经历，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多么复杂的情感图画。这就像是说，是学生而不是老师的子女保留了老师的真传。如果你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对“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这句话会体会更深，心情也更复杂。不知周作人对有些日本人说的我们日本人才是真正的汉唐子孙有何感受？反正，在日本，你会经常碰到这种像小孩子吵架一样的尴尬事。

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流行借鉴日本经验，当听人讲到日本的经营理念是《〈论语〉与算盘》（涩泽荣一著）时，还真吓了我一跳。心想，难道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孔老二”现在要教我们如何搞现代化了吗？细细想来还真有意思，日本人告诉我们的经验不是西方最先进的理论、最先进的对策，却是如何理解“孔老二”。照我们的习惯，搞现代化就得用最先进的理论、最先进的思想。当年我们搞革命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理论。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的启蒙教育，当年比现在还讲“创新”，而且是“真正的创新”——革命。

所以，我一直以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坏的”。记得当时提倡“破四旧”，四旧就是指“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反正，一切旧的传统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阻碍我们奔向幸福明天的坏东西。即使在今天，“创新”仍然是最激励中国人的话语，尽管在我们现在搞的“创新”中有许多是几十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前的东西。

现代的传统文​​化提倡者大都把日本作为支持复兴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的主要论据，尽管他们的观点与辜鸿铭类似，但辜鸿铭却苦于在他那个年代里找不到一个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日本现代化的成功，老实说，按照五四运动以来的主流思想，传统文化除了被当作包袱，好像没人说得明白它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当然，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更无法想像。现在看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采用日本模式，而且无论人们在感情上是否接受，行动上都是从模仿日本开始的。比如，战后韩国人搞工业化时，在感情上反日，在技术和经济上却模仿日本。

所以，周作人是从汉字文明圈的共同性来考虑中国和日本，并且由此